

王昌《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绪论

—

进入 21 世纪，海洋在国家战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海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但是，当前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前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与亚洲海洋邻国的一系列摩擦，引起时人极大的关注。在黄海，渔民捕鱼的问题时常引发中韩的争议；在东海，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争论不休，一度剑拔弩张；在南海，越南曾宣布对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则占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频频挑起事端。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已是当前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中国面临的海上问题并非今日独有。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在黄河流域，大陆的稳定历来是第一位的。沿海地区及邻近海域在中央政权看来不但容易滋生游民，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以成为勾结敌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混乱地带。明清以来，中央政权断断续续地采取了海禁政策。与之互为因应的则是海上的混乱局面。自明中叶以来的倭寇问题、明末清初的“海寇商人”、“荷夷”的骚扰，到清中叶的“大海盗”蔡牵等等，海上问题成为明清两朝的共同难题。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更是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起。

长期忽视海洋发展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以及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海洋理论的强势影响，20 世纪末，还有激烈的言论认为中国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和世界交流的国门，向海洋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海洋相关理论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湾学界陆续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自身海洋文明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逐步为学界接受。杨国桢先生在《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一文中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海洋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体系下的概念，经过麦金德的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

法构建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如何摆脱西方海洋文明的“话语权”控制，是当前中国海洋文明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海洋文明发展历程。无论是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郑和时代以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洋强国接连进入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和利润。中国方面，明中叶以来海禁的松动，特别是隆庆开海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大量来往于东亚、东南亚的各个港市经营“生理”，形成海外华人贸易网络。西方势力的到来，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竞争中。东西方势力进而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角逐。

本书关注的论题，是这一时期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海权竞逐。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郑成功的活动，表明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初，中国在东亚海域乃至世界海洋的舞台上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海权竞逐的结果，便是郑成功在与荷兰人的海权较量中胜出。他主导东亚贸易网络，并最终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郑成功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跨越台湾海峡“驱荷复台”，实为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海上展开的最早的、并且是规模较大的海上竞争。郑成功是否具有“海权”思维？这场竞争有何意义？“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这一论题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自身的海洋文明的内涵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郑成功在海上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重要财富。

二

民国时期已有朱希祖等学者对郑成功进行研究。此外，国内关于郑成功的研究成果较为明显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上。1962年，厦门举办了一次纪念郑成功复台3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以后，国内学界几乎每隔五年便举行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大致编成以下论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¹，主要为196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1982年重

¹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新整理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¹，《郑成功研究论丛》²，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³，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学术组选取台湾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⁴，1987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⁵，199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⁶，1997年泉州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⁷，200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⁸，2002年在泉州举行的纪念郑成功复台3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郑成功研究文集》⁹，2012年厦门举办的郑成功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除了以上郑成功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外，还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¹⁰及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¹¹张宗洽的《郑成功丛谈》¹²是个人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意大利研究者白蒂著有《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¹³此外，建国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更有数百篇之多。

受时代意识的影响，以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侧重点有明显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即从反殖民反侵略的角度研究郑成功驱荷复台的意义，以及“抗清”即研究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的民族气节及反民族压迫对清廷民族政策转变的意义。郑成功的阶级属性、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郑成功海上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关于郑成功的史实、郑成功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郑成功与台湾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步深入。20世纪末以来，开始有学者关注郑成功的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意义，郑成功与海权便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切入点。

¹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²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³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⁴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⁵ 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⁶ 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编：《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⁷ 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⁸ 泉州市政协、南安市政协主编：《郑成功与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⁹ 池本地主编：《郑成功研究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¹⁰ 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

¹¹ 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

¹² 张宗洽：《郑成功丛谈》，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¹³ [意]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庄国土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早期郑成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郑成功的整体研究,有傅衣凌的《关于郑成功的评价》¹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²,陈孔立、李强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³等。傅衣凌从国内矛盾认识出发,认为郑成功代表国内地主阶级抗战派及东南新兴海商利益,驱荷斗争保障民族独立,免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为康乾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他进一步提出评价郑成功应从亚洲历史进程中去认识,郑成功驱荷复台,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独立性及华侨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认为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迫使清廷调整与汉族地主关系,缓和民族矛盾,而驱荷复台则维护领土主权,开发台湾,为实现全国统一准备条件。早期大多数对郑成功的研究并未超出上述视野,而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论述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伟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⁴朱维幹的《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⁵、陈国强的《郑成功驱逐何况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⁶等。此外,还有专门从军事角度探讨郑成功的复台战争,如陈孔立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分析》,⁷陈碧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⁸、邓孔昭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⁹和《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¹⁰郭志超的《风潮对荷、郑和清、郑战争影响例析》¹¹,认为郑成功利用风潮,对登陆鹿耳门带来很大帮助。台湾陈锦昌的《郑成功的台湾时代》¹²可说是研究郑成功复台战史最详实的成果。作者收集中文史料和相关荷兰档案史料,较全面地还原了郑成功复台的战斗经过。

第二,对郑成功“抗清”的研究。主要有胡允恭的《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

¹ 傅衣凌:《关于郑成功的评价》,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9页。

² 傅衣凌:《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232页。

³ 陈孔立、李强:《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历史的“合力”之一例》,载《郑成功研究论丛》,第31页。

⁴ 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1页。

⁵ 朱维幹:《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载《郑成功研究论丛》,第1页。

⁶ 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47页。

⁷ 陈孔立:《郑成功收复台湾战争的分析》,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304页。

⁸ 陈碧笙:《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载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第1页。

⁹ 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载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第1页。

¹⁰ 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问题》,《台湾研究辑刊》2002年第3期。

¹¹ 郭志超:《风潮对荷、郑和清、郑战争影响例析》,载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第148页。

¹² 陈锦昌:《郑成功的台湾时代》,台北向日葵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在大陆出版时改名为《失落的超级舰队——郑成功与东方海洋霸权的瞬间》,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事迹》¹、陈在正的《一六五四一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和战关系及其得失》²、廖汉臣的《延平王北征考评》³、薛瑞录的《郑成功北伐战略新探》⁴、安双成的《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⁵、陈碧笙的《1657——1659年三次北上江南战役》⁶等。以上的研究，对郑成功军队的优势劣势的剖析十分详细，如郑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攻坚战等等方面均有提及。

第三，有研究者从郑成功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郑成功的思想方面，有刘伯涵的《郑成功与东林复社的关系》⁷、陈名实、林国平的《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及其影响》⁸、林其泉、郑以灵的《郑成功经济思想初探》⁹、黄志中的《试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¹⁰等。军政建设方面，有吕荣芳、叶文程的《郑成功在厦门的军政建设》¹¹、钱海岳的《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¹²、邓华祥的《略论郑成功为建设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¹³等等。

第四，关于郑成功的海上贸易。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韩振华的《一六五零——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的性质》¹⁴、台湾南栖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¹⁵，考证郑氏有杭州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及厦门的海五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来组织贸易活动，山海各商行也有刺探军情的作用。林仁川的《试论郑氏政权对海商的征税制度》¹⁶，认为郑芝龙的“令旗”兼有海上贸易通行证及海商船税的意义，此后郑成功继承此制度并改为“牌票”，征收“牌饷”。

此外，还有对“郑氏海商集团”的研究。聂德宁的《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¹⁷，认为郑成功继承发展了郑芝龙的海上实力，并且整合了浙海水师力量，对其海外贸易形成有力保障。郑成功还丰富其贸易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

¹ 胡允恭：《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事迹》，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245页。

² 陈在正：《一六五四至一六六一清郑之间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114页。

³ 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载《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85页。

⁴ 薛瑞录：《郑成功北伐战略新探》，载《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74页。

⁵ 安双成：《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115页。

⁶ 陈碧笙：《1657——1659年三次北上江南战役》，载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第175页。

⁷ 刘伯涵：《郑成功与东林复社的关系》，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303页。

⁸ 陈名实、林国平：《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及其影响》，《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⁹ 林其泉、郑以灵：《郑成功经济思想初探》，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161页。

¹⁰ 黄志中：《试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178页。

¹¹ 吕荣芳、叶文程：《郑成功在厦门的军政建设》，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第148页。

¹² 钱海岳：《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322页。

¹³ 邓华祥：《略论郑成功为建设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载《郑成功研究论丛》，第123页。

¹⁴ 韩振华：《一六五零——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¹⁵ 南栖：《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载《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194页。

¹⁶ 林仁川：《试论郑氏政权对海商的征税制度》，载《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60页。

¹⁷ 聂德宁：《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

从而在与荷兰人的竞争及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胜出。郑克晟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¹认为郑氏集团有成员成分复杂、内部重要成员相对独立、依靠宗族关系和乡亲关系来保持郑氏“舶主”地位的特点，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便难以团结，导致郑氏集团最后的失败。

第五，郑成功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聂德宁的《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²一文，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内，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经历了被掳掠到竞争以至抗争的过程。最终郑成功击溃荷兰人，保护了中国海商利益。李德霞的《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³，认为荷兰东印度与郑氏集团之间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竞争，但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商业贸易方面都处处受制于郑氏集团，最终不敌郑氏集团。文章对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详细，但限于篇幅，对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与荷兰之间的竞争事实则简略带过。

庄国土的《析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⁴认为，郑成功对菲律宾西班牙人的檄文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其商船安全及公平贸易，客观上并没有达到护侨的目的。郑山玉、于东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管窥》⁵认为，郑成功有保护华侨的目的，但此文在翻译上的曲折使得在解读过程中易产生歧义。

黄玉斋的《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⁶，提到郑成功在 1648 年、1651 年曾向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求援，1658 年对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求援。杨国桢《闽在海中》⁷一书的第五章“隐元禅师与仙岩”考证隐元禅师 1654 年在厦门的相关活动，认为隐元禅师受郑成功所托赴日求援的可能性较大。但胡沧泽的《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⁸认为隐元赴日主要在传佛法，与郑成功借兵无关。汤锦台的《郑氏父子与平户》⁹，认为从王直以来在平户的华商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郑成功受到这一力量的支持。在日本的经历使

¹ 郑克晟：《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² 聂德宁：《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南洋问题研究》1994 年第 3 期。

³ 李德霞：《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海交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⁴ 庄国土：《析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载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第 389 页。

⁵ 郑山玉、于东：《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管窥》，载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编：《郑成功研究》，第 307 页。

⁶ 黄玉斋：《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载《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 263 页。

⁷ 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8 页。

⁸ 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泉州市郑成功学术研究会编：《郑成功研究》，第 232 页。

⁹ 汤锦台：《郑氏父子与平户》，载《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 34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54 页。

得郑成功对荷兰人有所了解，从而打下驱荷复台的基础。

(二)郑成功与海权的相关研究

虽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郑成功与海权的关系，但限于史料及研究视野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20 世纪末以来，海洋史学的兴起，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步引起重视。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台湾学者方豪在 1950 年发表的《明郑的海权掌握与对外关系》¹，注意到海权对于郑氏的重要性。文章认为，海权的掌握是郑成功抗清驱荷的基础，海权和海利是明郑的生命线。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日本商业贸易往来，是郑氏海权的基础。可惜文章并未结合史实铺开论证，也未对“海权”的概念做明确界定。

杨国桢在 2003 年发表的《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²，认为郑成功海上政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的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经济在沿海社会发展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填补了明末以来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促进了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隆庆时期以来，中国的海洋社会权力经历了从民间——地方官府——海上政权的整合，代表了中国沿海社会向海洋的转向。水师和海洋贸易是郑成功海上政权的基础，郑氏政权行使明朝中央政权的公权力，以政权形式组织海洋贸易，鼓励私商，以武装保护海上安全和商业利益，与海洋世界规则接轨，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由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长期停留于民间地方层次，无法与清朝政府抗衡。海洋政权的失败，使得中国错过了通过海权竞争融入世界市场的战略机遇期。文章在东亚海权竞争背景下考察明末海洋社会权力，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及对海洋社会组织结构、运作进行分析，无疑打开了一个新视角。

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³，认为郑成功的早期经历及家庭背景使其形成了一种海洋性格，认识到海上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一种海权思维。文章列举了郑成功海上活动的事例，分别是派官员到台湾魷港向中国渔民

¹ 方豪：《明郑的海权掌握和对外关系》，载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版，第 953 页。

² 杨国桢：《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载杨国桢：《瀛海方程》，海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5 页。

³ 郑永常：《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成大历史学报》2008 年第 6 期。

征税，派何斌在鸡笼借打捞沉船测量港口水深，抗议大员荷船夺去属下商船及财物，维护海域航道安全，禁航马尼拉的禁令，警告和抗议巴达维亚查扣商船和货物，对大员禁运及发布回航令，想将常寿宁放逐台湾的想法，对安然无礼的处理，委托何斌在台湾征收通行税，攻取台湾，诏谕吕宋一共十二个事例，说明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并以马汉的海权论来印证，认为郑成功的海权思维接近其时的荷兰人¹。文章以海洋性格及海权的视角来检视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研究视野上可认为已有突破。但本文读者可能产生些许疑惑，比如，海洋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另一个问题则是，仅仅对郑成功的经历及涉海活动事例的考察，来说明郑成功的海权意识及郑氏政权为海权国家，是否足够充分？考虑到海权及海权国家的内涵与欧美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相关，因此，在判断其他地区的时，是否也应将具体国家或是政权的历史背景、社会构成等因素纳入考量？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作者并未对此详加论证。

倪乐雄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²，认为郑氏水师与西方意义上的海军相似，表面中国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条件下也能产生一定规模和程度的资本主义。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³，认为郑清的南京之战和厦门高崎之战展现量海权对陆权的优劣势，海权和海利是郑成功集团成败的关键。此外，作者还有《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⁴一文，认为郑成功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面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上力量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作者一系列的文章主要从军事、战略方面考察郑氏政权，在事实的论证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另一个主要问题则是相关概念的界定，作者在许多论述中将“海权”与“制海权”等同，⁵有待商榷。

意大利的研究者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⁶一书把郑成功的活动置于远东的复杂形势下进行考察，强调郑成功的活动对远东海域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李旦、郑芝龙开始，中国的海上力量得到统一，

¹ 郑永常：《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成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6期。

² 倪乐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³ 倪乐雄：《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⁴ 倪乐雄：《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⁵ 参见倪乐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⁶ [意]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庄国土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得以在东亚海域与西方海洋强国竞争，并凭借对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掌控及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在竞争中胜出。东亚海域的局势变化引起了西方海洋强国的调整与变化，从而影响了近代欧洲历史的进程。此书的视野跳出了中国沿海与台湾海峡，将郑成功在东亚的活动置于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视野方面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此书视角广阔又限于篇幅，在许多细节方面作者并未深入地分析。对郑成功的商贸活动、与各方势力在海上的竞争和冲突等等史实的处理似乎过于简略，而对郑成功的政权组织及中国沿海的社会背景几乎没有涉及。以上几点虽非本书研究最主要之目的所在，但未加注意，对于认识郑成功及其海上政权在东亚海域的地位而言，或许是一个缺憾。

上述研究已是针对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研究的仅有成果。如上，虽有学者已关注郑成功与东亚海权角逐的新视角，但对于郑成功与海权的研究，理应顾及当时中国东南社会的历史背景及郑成功海上政权的作用。此外，“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其内涵如何界定？

三

“海权”的涵义到底如何理解？当前学界对于海权尚无统一的定义。

有研究者认为，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空间的行动自由权。¹也有人认为，海权在经典意义上，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²另外还有人认为，海权，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但是这种权利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³总体来说，研究者在使用“海权”这一概念时，大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侧重海上权力或力量；二是侧重海洋上的权利；三是侧重海洋权利与海上力量结合起来。

“海权”的不同解释无疑极易引起理解和运用的混乱。海权既是一个外来词汇，若不考察其外文原意而随意加以个人的理解，恐难言合理。有研究者指出，在近代中国，首先使用“海权”一词的是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海战新义》，此书在1885年刊印，其中说：“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是，当

¹ 张世平：《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² 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³ 朱华友：《中国海权战略序言》，载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前并不清楚其对应的是英文词汇或是德文词汇。¹此后，“海权”一词逐渐出现于清廷官方记载。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称：“由荷赴义。行抵罗马。观其庶事克修。俨然强国。海军制度。可与各国抗衡。地处温带。最宜蚕桑。滨海之国。大要尤注意渔业。于扩张海权。有绝大关系。”²

以“海权论”风靡世界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初版在 1890 年。1897 年，马汉在给伦敦出版商马斯顿的信中说：我可以这样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所选用的，现在已这样流行的 *Sea power*。这个名词，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们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 *maritime*。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太通俗，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或是不能使人们把它放在心上。*Sea power*，至少其英语意义，看来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义。³马汉自己指出 *Sea power* 是其“选用”的，可见，在马汉以 *Sea power* 作为其著作中的主要概念以前，这一词汇早已流行于欧美社会。马汉的著作是对海权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影响深远，但这一思想无疑曾经历了一定时段的积累与沉淀。此后，中国学人普遍将 *Sea power* 翻译为海权。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Sea power* 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以一个国家无视敌人和竞争者使用海洋的能力为准则，它由不同的因素构成，比如战术、武器、辅助设备、商业航运和受训练的专业人员。”⁴而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Sea power* 的解释是“能够使一个国家控制一部分海洋并拒绝敌对国家海洋的利用、维护一个国家战争或平时期的海洋权利的军事力量。”⁵ 词条的最后注明这个解释引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这两个解释固然不能完全代表 *Sea power* 在 19 世纪末在欧美社会的涵义，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汉曾言，海权的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⁶而影响海权发展除个人因素外，主要是“不仅包括用以

¹ 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² 《清德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一，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

³ 参见张炜、郑宏：《影响历史的海权论（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 页。

⁴ *sea power*, means by which a nation extends its military power onto the seas. Measured in terms of a nation's capacity to use the seas in defiance of rivals and competitors, it consists of such diverse elements as combat craft and weapons, auxiliary craft, commercial shipping, bases, and trained personnel. 见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530698/sea-power>。

⁵ *Sea power*, naval strength which enables a state to control part of the sea and deny its use to enemy nations or to uphold its maritime right in time of peace or war. 见《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784。

⁶ [美]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等译，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而且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生存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从马汉对海权的这些描述来看,显然海权包含的意义极广,但海上军事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依此看来,国内研究者如张文木认为的英文 Sea power 表示的是“海上力量”、“海上权力”而非“海上权利”¹,以及倪乐雄认为的“海权一般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²是比较符合马汉“海权”原义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否有“海权观念”,或是“海权思想”?有研究者认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³但另一个观点截然相反,也是诸多历史学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王家俭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⁴杨国桢指出,若以马汉对海权所描述的“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这两个要素来看,明嘉靖时期吴朴的《渡海方程》中就存在海权主张。这本书可惜已失传,但同时代人的一篇读书札记中对此书有记录,“其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南至太仓刘家河开洋,开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指岛屿)为标准。…每至一国,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其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蛮夷之情,与之交则喜悦,拒之严反怨怒,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船司以通有无,中国之利。”⁵显然,若没有对中国古代涉及海洋的言论进行详细考察,就对中国古代是否具有“海权观念”做出判断,毫无意义。

“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在其产生与当时的欧美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内涵也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张文木言,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对于海权会有不同的理解。⁶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作者指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海上力量、海上基地与殖民地、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而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

¹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² 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³ 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⁴ 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薈》,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

⁵ 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载杨国桢:《瀛海方程》,海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⁶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有六点，分别是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但是，马汉所得出的观点，出自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海洋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以“海权论”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东亚历史上的海洋问题，是否合适？

从亚洲海域的历史形势来看，与欧美国家的海洋发展历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东亚海域的地理特点，是其“亚洲地中海”的特征，可以说，这片海域是较为封闭的。西边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是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东边则是岛链外巨大的太平洋。亚洲海域的历史特点，是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性优势。具体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中国的传统的夷夏观念下，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名义上是政治附属国。史蒂文·德拉克雷的《印度尼西亚史》中提到，十世纪初，室利佛逝派往中国的正规外交使团建立了与中国皇帝的友好关系，中国更愿意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本质上的属邦关系……持有室利佛逝特许状的商人、室利佛逝的同盟国和委托人，获得了靠近获利丰厚的中国贸易的特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室利佛逝国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它获得了海上帝国的规模和地位。¹15世纪以后，马六甲国家在获得了中国的贸易优先权和贸易保护之后，迅速地变成那一地区的主导力量。²葡萄牙人攻击马六甲时，“王苏端妈未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其还故土。”³

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⁴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济、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⁵

明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中，建议国家应在中南半岛各港市设立“市舶司”，驻派军队保护贸易。这个建议的背后，无疑把中南半岛的国家认为是自己的附属国。

另一方面，在17世纪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之前，中国的东南民间商人已在东亚海域形成了贸易网络。华商和中国帆船是这一海域的主角。有学者指出：“月港开放后的40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⁶即便中国的

¹ 史蒂文·德拉克雷：《印度尼西亚史》，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页。

² 史蒂文·德拉克雷：《印度尼西亚史》，第21页。

³ 《明史》卷三二五，《列传》第二一三，“外国六”。

⁴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洪武二年正月乙卯条。

⁵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庚辰。

⁶ 杨国桢：《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中央政府从海洋退缩，但中国方面民间的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仍是一家独大。取得中国方面（官方或是民间海上力量）的许可，便可在东亚海域进行贸易、渔业等海上活动。在此背景下，“海权”的竞争，其实是“海洋社会权力”的争夺。

“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是由杨国桢先生提出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中央控制力下降，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朝贡贸易衰落，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孕育兴起。¹海洋经济是海洋社会的基础。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²“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编成。粗略地说，它的基层组织包括海上生产、生活的社会群体，如渔民、船员、水手、海商、海盗等等；海岸带陆域的农村、港口城镇、渔村聚落、宗族和民间会社，海洋资源或产品的加工、仓储、运销、研究的机构，海洋管理和服务的部门。亦即各种海上力量以及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编成。和陆地社会具有显著差别的，是各种社会群体组合的船上社会。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民间海洋社会权力的存在是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与官方行使的公权力相抵触，因而被视为违法行为。³

杨国桢先生指出，海洋社会权力在 16-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商业的能力。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传统亚洲海域的局面。对于欧洲人来说，不管是在教封闭的地中海，还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航行，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海上强劲的对手，各海域时常还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地理大发现以来，首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海上展开角逐；16 世纪的荷兰联合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是西方海上势力的一次洗牌。这些西方国家需要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商船和航线，需要帆船的补给基地和贸易基地，才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立足。因此，当马汉分析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的海权历史，便提出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斗争、相互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

¹ 杨国桢：《明清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载《瀛海方程》，第 131 页。

² 杨国桢：《试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载《瀛海方程》，第 19 页。

³ 杨国桢：《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十九世纪初“打海盗”蔡牵为中心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争的暴力行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见证。”¹并且，殖民地和海上基地、海上力量、海上航线是海权的构成要素。

海权是基于军事力量对海洋控制和利用的能力。这一点上，“海权论”与“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所强调的内涵是一致的。“海洋社会权力”指出，在 16-17 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域，主要表现在商业能力和军事能力。而“海权论”认为海上力量、殖民地和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本文认为，考察在 17 世纪中期的东亚海域的海权问题，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需要借鉴的。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方便叙述，本书所指“中国沿海”特指中国东部、南部的近海区域，而“东亚海域”则包括除近海以外今日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东部、南海以及巽他群岛附近的海域。

四

本书从东亚海权竞逐的视角解读郑成功的海洋活动，以时间线索为主线，参杂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文部分包含五个章节。

绪论，本章说明本书选题的缘由、郑成功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回顾，以及本书所指“海权”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17 世纪前期的东亚海权格局。本章主要说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东亚海权的状况，主要包含中国沿海的形势以及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等。

第二章，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本章说明郑成功的出生以及他如何继承郑芝龙的势力，并利用南明的政治影响取得闽海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建立海上政权。本章还将就郑成功海上政权的特征以及郑成功重要部下 Gampea 的身份进行研究。

第三章，东亚海域的角逐。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东亚海域的其他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东亚各地贸易权、航行权的竞争，以及荷兰人占据下的大员的争夺，是本章的重点。这一时期大员的重要华人何斌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本章探讨的问题之一。

第四章，中国沿海的争夺。本章说明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制

¹ [美]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

海权上的争夺以及海上政权的困境、郑成功东进台湾的原因。

第五章,海上基地的开拓。本章主要通过对郑成功攻克大员关键战役的研究,探讨郑成功获胜的原因。此外,郑成功的个人因素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以及郑成功对马尼拉未完成的远征计划,也是本章将涉及的问题。

第六章,结语,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既有的中文相关史料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

中文史料方面,郑成功属下杨英的《先王实录》是郑成功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之一,厦门大学的陈碧笙教授曾校注此书,本文即采用此版。此外还有《台湾外记》、《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等一大批明清之际的文人留下的记载,以及沿海地区的地方志、郑成功相关人物的文集、杂记等等,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郑成功研究的另一便利,则是各种相关史料集的编辑出版。这一部分史料集主要有:《郑成功史料选编》¹,主要从明清史籍中摘录与郑成功有关的记载;《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²,主要是清廷档案中的郑成功相关史料;《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³,则摘录包括《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被忽视的福摩萨》、《巴达维亚城日志》等外文史料;《郑氏史料初编》⁴、《郑氏史料续编》⁵、《郑氏史料三编》⁶则是从明清宫廷档案中辑录的郑氏相关的史料;《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⁷,补充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未收录的顺治十三年以后与郑氏相关的满文档案。此外,还有《郑成功在潮州活动资料》⁸,则专录郑成功在粤东活动的史料。

此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主要是《巴达维亚城日志》、《热兰遮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

《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都是当日之荷兰人在其商馆中所留下的记录。《巴达维亚城日志》是由巴达维亚城总督府将该市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¹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 1982 年版。

²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³ 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⁴ 《郑氏史料初编》,台湾文献丛刊第 157 种,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版。

⁵ 《郑氏史料续编》,台湾文献丛刊第 168 种,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版。

⁶ 《郑氏史料三编》,台湾文献丛刊第 175 种,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版。

⁷ 《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史料译编》,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七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04 年版。

⁸ 郑绪荣辑编:《郑成功在潮州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中心 2007 年版。

和东南亚各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报告书要纲整理合并，以日记体裁写成。

《巴达维亚城日志》最早由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日译，其中第一、二册由郭辉再将之中译，第三册由程大学中译。《巴达维亚城日志》的中译较早，学者利用也较多，如台湾史专家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便大量引用《巴达维亚城日志》的内容。《热兰遮城日志》则是大员荷兰商馆的日志，主要记录台湾及附近地区的事务。此日志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文献，读者原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为往来书信作证。台湾学者江树生旅居荷兰二十余年，于 2011 年终于将全部四册中译。这些日志虽是荷兰人站在其立场而写成的文字，但内容丰富，其中许多类似记流水账的贸易细节，不失为可靠的资料。这一资料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一文，便以此日志为主要史料。

《东印度事务报告》又称为《总督一般报告》，是东印度公司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其在亚洲的活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十七董事会要求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评议会要定期就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提交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用途在于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制定政策做参考。程绍刚将其中与台湾有关的记载中译汇编成《荷兰人在福尔摩沙》。这一报告的特点在于对东亚各地的荷兰商馆以及与其相关的实务均有记载，对《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是极好的补充。

此外，还有零星中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的传教士、航海者留下的记录。如荷兰学者胡月涵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往来的函件》¹，选译翻译了 1653-1656 年之间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其中关于 1653 年荷兰抢劫广南返回厦门的中国商船事件的细节披露，郑成功求医荷兰，1656 年郑成功禁航大员、马尼拉等等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由于中文史料对于郑成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记载甚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使得本书的研究成为可能。

¹ 胡月涵：《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往来的函件》，《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292 页。